

明末清初赋学通变论

倪晓明

(大连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从赋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赋学的转型期。“通”中有“变”是明末清初赋学的主题。“通”表现为对汉赋经典化态势的延续,对汉魏六朝赋学理论话语的阐发;“变”体现在赋注的衰减、赋评的勃兴。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对汉赋作品的汇编是汉赋经典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对六朝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构成了明末清初赋论的主体框架。汉唐尚注疏,宋明重议论,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是学术大势演进的结果,万历以降兴起的《文选》评点丰富了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而从注到评的转捩反映出赋学发展方向的转变。

关键词:明末清初;赋学;通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4-0142-08

收稿日期:2024-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9):历代赋论整理研究。

作者简介:倪晓明(1990-),男,山东临朐人,大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4.001

明末清初辞赋理论是中国赋论史、赋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以17世纪为时间背景,涉及到明亡清兴百余年的时间段,是近古赋论、赋学的典型反映。本文围绕明末清初赋学的汉赋接受、话语生成、赋注衰减、赋评勃兴等问题展开,并试图对明末清初赋学在中国赋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略为估定。

一、延续汉赋经典化态势

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一部赋学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汉赋发展与接受的历史。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在强调学术问题之于学术史的关联性与系统性。与前代相似,明末清初的赋学,仍旧是以汉赋为准绳。无论创作层面的模拟,主题方面的延续,理论层面的继承,始终围绕“汉赋”展开,而汉赋经典化的确立方式虽众多,基础文本文献的整理汇编,却堪称广厦之基。

明末清初以来诞生的大量汉赋选本,对于延续汉赋经典化态势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周履靖《赋海补遗》,李鸿《赋苑》,施重光《赋珍》,俞王言《辞赋标义》,袁宏道编,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两赋》,陈山毓《赋略》,清初赵维烈《历代赋钞》,王修玉《历朝赋楷》,陆棻《历朝赋格》,陈元龙《历代赋汇》等专门性赋学总集均对汉赋有较多著录。

周履靖《赋海补遗》共收录明前辞赋269篇,从部类设置情况来看,全书共分天文部,时令部,节序部,地理部,宫室部,人品部,身体部,人事部,文史部,珍宝部,冠裳部,器皿部,技艺部,音乐部,树木部,花卉部,果实部,芝草部,饮饌部,飞禽部,走兽部,鳞介部,昆虫部共23部。这种类目设置体例显然受到了类书的影响,凸显出周氏追求“大”“全”的宗旨,从其辑录汉赋篇目来看:

天文:公孙乘《月赋》、赵壹《迅风赋》

地理:张衡《归田赋》

宫室: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王粲《登楼赋》、枚乘《梁王兔园赋》

人品:蔡邕《讥青衣赋》

人事:司马相如(应为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苏顺《叹怀赋》、曹大家《东征赋》、崔骃《大将军西征

赋》、蔡邕《检逸赋》、蔡邕《协初赋》

珍宝：徐幹《碎磲碗赋》

器皿：刘安《屏风赋》、邹阳《几赋》、杜笃《书赋》、班固《竹扇赋》、刘歆《灯赋》、曹大家《针缕赋》

音乐：蔡邕《弹琴赋》

树木：蔡邕《故栗赋》、繁钦《桑赋》

果实：王逸《荔枝赋》

飞禽：路乔如《鹤赋》、王粲《白鹤赋》、赵壹《穷鸟赋》、王粲《鸛赋》、曹大家《大雀赋》、孔臧《鸛赋》

走兽：公孙诡《文鹿赋》

昆虫：曹大家《蝉赋》、孔臧《蓼虫赋》

从篇目去取来讲,《赋海补遗》遵循“略耳目之所逮,搜僻隐之奇文”的原则,在选赋时“避熟就生”,确定了搜罗遗佚的选赋标准,以凸显其“补遗”之大旨,像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谢惠连的《雪赋》,谢朓的《月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张衡的《思立赋》等《文选》收录的名篇一概不收。至于其原因,《赋海补遗序》云:“言玄象,不必《梁园》、《雪》、《月》之奇;咏坤舆,非藉《江》、《海》、《天台》之笔。至于侈宫室之壮丽,则追踪《鲁殿》、《铜台》;指人事之繁多,则媲迹《思立》、《感士》。”^①故《赋海补遗》不收《文选》已收作品,仅收遗佚在外的佳作。另一方面,诸如京都、郊祀、田猎、纪行、游览、江海等《文选》确立的类目,《赋海补遗》一律不设,而是参照类书增加了诸如草、木、鸟、兽,饮食、器用等题材的篇幅,均凸显其“赋海补遗”的性质。

实际上,自汉赋作品诞生以来,相关的辑录整理工作便已经开展。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便对包括辞赋在内的大量文献进行校理工作。《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在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②,又将战国秦汉的诗赋作品划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和歌诗五种类型。六朝时期汉赋整理实现了从作品汇编向别集、总集纂录的文化转向。《隋书·经籍志》收录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赋四大家”在内的汉代作家别集 47 种,然魏晋南北朝的赋总集,如谢灵运、刘义宗、刘彧等人辑同名《赋集》,萧衍辑《历代赋》,傅玄辑《七林》,谢灵运辑《七集》,佚名辑《皇德瑞应赋颂》等尽皆亡佚,现存完整的总集仍推《文选》。然不管文献价值,还是创作范式,汉赋作品的汇编均使得汉赋在后世得以持续经典化、范式化。毕竟,若无总集收录,“经典化”之路便随之中断,而明末清初辞赋总集对汉赋作品的大量著录,实则是对既有态势的延续。

专门性赋集之外,明末还诞生了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文学总集。张溥之书收录汉代 20 位作家的别集,对汉赋作品保存较为完备,与《七十二家集》一道标识了六朝文学在明末纂集的兴盛。尤足称道的是,二书为每集所撰题辞及小序,辞约义丰,视野宏通,如张溥为司马相如集所撰序文云:“《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摩,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美人赋》风诗之尤,上掩宋玉,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迁形状,安能及此?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彼曾与盛长通言之,歌合组,赋列锦,均未喻耳。”^③类似评价具有较高赋论价值,从理论层面强化了汉赋的经典化进程。

赋集编纂首先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将汉代赋家的重要赋学文献留存后世。此外,赋集除保存汉赋文献、提供创作范式的功能之外,还具备去芜存菁、删汰繁缛的甄别功能,《隋志·总集类序》所谓“采撷孔翠,芟剪繁芜”^④,这是强调总集选录篇章时严分去取,因之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与示范性。归根结底,后

①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54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701页。

③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4页。

④ [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1089页。

世赋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汉赋的继承,汉赋经典化是中国赋学史上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后世赋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对汉赋的模拟,嗣后在时代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转向、历史态势多重因素的交融下,实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转型。赋集的编纂,使得后世赋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觅得极佳创作范本,既能从赋体态势层面加以仿效摹写,又能从赋家之心层面获得熏陶激励。拟之以为式,循之以渐进,这种范式意义值得重视。

二、继承先唐赋学批评话语

自汉至清,不仅有卷帙浩繁的辞赋作品问世,更生成了数量可观的赋学批评话语,它们构成了中国赋论史的主体。然而,赋学概念、范畴、样式固然丰富,但六朝以后赋学话语的创新性却逐渐递减,呈现出赋学话语更新的乏力,以至于唐以后的赋论史更多是对汉魏六朝赋论话语的延续与阐释。

明末清初的赋学批评,延续了唐以来的“阐释性模式”,对汉魏六朝时期诞生的“不歌而诵”,“赋者,古诗之流”,“劝百讽一”,“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赋迹、赋心”,“诗赋欲丽”,“赋体物而浏亮”,“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稽之地图,验之方志”等赋学话语进行多方位、广角度的解读。以“赋者,古诗之流”为例。作为赋论史上的经典话语,“赋者,古诗之流”在后世不断流衍、接受,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赋学领域的一种“共识”。挚虞《文章流别论》、白居易《赋赋》、祝尧《古赋辨体》、陈绎曾《文筌·赋谱》、吴讷《文章辨体》等,均援引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念。明末清初,陈际泰《刘西佩放生赋序》、冯班《钝吟杂录·读古浅说》、钱澄之《停云轩赋序》、赵维烈《历代赋钞序》、王修玉《历朝赋楷序》、毛奇龄《丁茜园赋集序》《田子相诗赋合集序》、叶方蔼《御试南苑赋有序》等均对“赋者,古诗之流”有所阐发。叶方蔼《御试南苑赋有序》云:“昔人有言:赋者,古诗之流。所以称颂君德,宣扬国体,托讽谕,抒忠爱,匪徒以靡丽之词竞工拙而已。我皇上缙承鸿绪,侯尉一家,车书万里,比隆唐虞,超轶殷夏,曩哉尚矣!”^①叶氏旗帜鲜明地将“赋者,古诗之流”与“称颂君德,宣扬国体”相交融,是康熙朝赋体颂德的鲜明例证。在古典政治体系模式下,通过“赋源于诗”的逻辑限定,使赋具备了与诗相近的实用功能,长期充当官吏选拔标准中的重要科目。这与古典政治体制中文士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匹配,与帝王对文士、文章的政治期待相协调,是庞大体系运作机制的一个环节。论者在班固基础上对此予以阐释,尽管区分为体制、源流、功用几个范畴,但总体未出经学话语的框架。

然从文体学角度而言,“赋者,古诗之流”说并不符合文体发展的实际情形,赋与诗在文体规模,文体形态,文体属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古诗之流”说在本质上是经学语境的产物,其旨在强调“诗—赋”学术谱系的合法性,却忽略了“诗—赋”文体谱系的合理性。^②另一方面,论者又通过“赋源于诗”的文体溯源,将诗的“情性”内核赋予辞赋,从而顺理成章地以“主情说”论赋。然就辞赋文本来看,“主于情性”的观念也与赋体文本相违背,尤其是铺陈名物为主的散体大赋。如《上林赋》铺写果木云:“卢橘夏熟,黄甘橙橐,枇杷燃柿,棣柰厚朴,栲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栝逯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③这段铺陈以联边字为主,“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④,但联边字与名物的交错使得赋家性情淹没不显,并未反映出“主于情性”的文体特征,这与诗歌的摇荡性情,动人心魄的文体风格南辕北辙。

汉晋之后的骋辞大赋延续并发展了铺陈模式,使得赋与类书,赋与方志的关系渐趋密切,由此产生了《事类赋》这种介乎类书与辞赋之间的文本类型,以至于袁枚《随园诗话》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

① 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第10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861页。

② 易闻晓:《赋论建构与赋体自立》,《光明日报》2023年6月26日第13版。

③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册,第3028页。

④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第511页。

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①袁氏将大赋与类书、志书、字汇相提并论，后三种文献类型何尝与情性有关？但是，赋“主情性”的观念却在中国赋学领域一直绵延不绝，直至晚近章太炎明确提出“赋离于性情”的论断，才使得这一“共识”渐被质疑。^②

与“赋者，古诗之流”相似，其他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话语在后世被反复阐释、解读，是中国赋学史上的重要文论遗产，而实用理性、政教观念的强制介入是一个重要原因。《汉书·艺文志》标举赋的交接邻国之功用，《两都赋序》云“润色鸿业”，《文心雕龙》论“体国经野”，均致力于表彰辞赋在褒赞圣朝层面的功用。清初孙潜孙《华国编赋选序》云：“文章皆可华国，而赋为尤最。盖赋主乎颂，颂者，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可以谐金石，被管弦，特变其依永和声之律而为摘文铺藻之词。……梁《昭明文选》首赋、次骚、次诗，而后及于赞、颂、箴、铭、诏、告、教、令之属，岂非以赋所以鼓吹休明、润色鸿业而为学士大夫，华国之文所必先者欤？顾其质文递变，源派各殊，自荀、宋托体讽谕，而汉代武、宣之世，公卿大夫以及言语侍从诸臣竞作赋以为献纳，寓昌言正论于缠绵悱恻之中，运灏气真神于藻绘雕镂之内，陆离光怪，浑古渊穆，班固所谓‘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者’是矣。”^③孙潜孙认为各体文章皆能起到“华国”的功效，赋更为诸体中最具“华国”功能之文体形态，其列举论述《文选》文体排序、魏晋赋颂为例予以论证。功用之外，唐代以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领域掀起的一次次的“复古”风潮，尤其是明代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调将汉魏六朝辞赋持续经典化的同时，也强化了汉魏六朝赋论的典范性质，而对汉魏六朝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反映出明末清初赋学的传承性。

总体来看，尽管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的转换为赋学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但明末清初的赋论总体未能超越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论框架，且更多学者是“照着讲”，少数学者是“接着讲”。“一部古体赋史，既是以汉魏六朝（包含骚体赋）为开端的，也是以此为收束的。对汉魏六朝辞赋作家、作品以及命题的拒斥迎合构成古体赋学的全部内容”。^④后世赋学的发展，既是对汉魏六朝辞赋文本的模拟与新变，也是对汉魏六朝辞赋理论的会通与阐发。

三、赋注衰减

明末清初赋学领域的一大变化在于赋注的缩减。据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统计，汉代未有专门性赋学总集，但有十五种赋注著作。班昭为班固《幽通赋》所撰注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赋注类作品。此外，延笃、服虔、应劭在内的十五位汉代学者曾为《史记》《汉书》作注，由于《史记》《汉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汉赋作品，故赋注随书注得以流传。魏晋南北朝注书风气依旧兴盛，共产生了包括薛综、晁错、傅巽《二京赋注》，司马彪、郭璞《子虚上林赋注》，张载《鲁灵光殿赋注》，綦毋邃、刘逵、卫权《三都赋注》在内的36部赋注。唐代由于《文选》学的发达，以六臣注为代表，延续了汉魏六朝“注多于集”的发展态势。宋元以降，总集编纂日兴，赋注递减，明末清初延续了这一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赋注衰减”是就总体趋势，尤其是就赋注与赋集的相对数量而言。与汉魏六朝时期“注多集寡”相比，明末清初显然呈现出“集多注寡”的局面。根据《中国赋学文献考》统计，明代现存单篇赋注6部，赋总集19部；清代赋注14部，赋总集122部。具体而言，明末仅有刘浴德注《脉赋训解》，谢昌撰《雪心赋解注》，清初则孟浩注《雪心赋正解》，江之淮注《雪心赋正解》，冯李骅注《扬雄蜀都赋读》，徐树穀、徐炯集注《庾开府哀江南赋注》，共6部单篇赋注。与赋集编纂之繁夥相比，赋注之明显寡少，体现

①[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倪晓明：《论章太炎赋学思想的“求是”精神》，《社会科学动态》2023年第5期。

③[清]孙潜孙：《华国编赋选》，踪凡、郭英德主编：《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第2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④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出此时期“集多于注”“集盛注衰”的特点。

明清以来,随着辞赋作品的与日俱增,科举试赋的兴盛,赋总集编纂蔚然成风不难理解。问题在于,为何赋注会骤减?这固然与明清时期赋总集兼赋注的情形有关,“单独成书的赋注文献数量不超过10种,但赋总集、赋别集中亦有丰富的赋注材料”^①。然就明末清初赋学而言,大多数赋总集或有评无注,或评、注俱无。俞王言《辞赋标义》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批评,又有注释的总集。总体来看,此时期与汉唐相比,赋注呈现出锐减的情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风转向。汉唐重注疏,宋明好议论,是中国学术态势的一大转移。《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云汉代学术“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又论宋明学术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具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②汉唐重传注义疏,诞生了毛亨的《毛诗传》,孔安国《尚书传》,郑玄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以及孔颖达《五经正义》,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陆德明《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等经典注疏之作。宋明理学、心学大兴,经典注疏风毛麟角,传世者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数册而已,反倒是汇编目录、类书、丛书、大全类书籍之风甚盛。宋代的《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等目录书,宋代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四大类书,明代的《永乐大典》《汉魏丛书》等丛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大全”类书籍均反映出学术兴趣的转移。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明末清初的赋学家更多从事于辞赋创作、辞赋评点、赋集编纂、赋论书写等偏重于辞章、义理范畴的工作,相对轻视了赋学注疏与考据,故明末清初赋学发展呈现出“重评轻注”“集盛注衰”的总体态势。一言以蔽之,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实际是整体学风转向的结果。

第二,旧注甚佳。经学是古典学术的中心。围绕经典文本的传、注、解、疏等训诂工作,始终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头戏,甚至有“经学即小学”的观念。在经本位的文化语境中,经学的注释模式亦延伸到史、子、集三部之中。赋学注疏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作为现存第一部完整赋注,班昭为《幽通赋》所做之注便受到汉代注经风气的影响。举例而言,《幽通赋》云:“系高项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班昭注云:“系,连;胄,绪也。高,高阳氏也。项,帝颡项也。言己与楚同祖,俱帝颡项之子孙也。水北方黑行,故称玄也。”^③据此,班昭注文较为简洁明了,语言凝练。再如《幽通赋》云:“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班昭注云:“滔,漫也。泯,灭也。夏,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乱,犹行歌谣,意欲救乱也。《诗》云:‘我歌且谣。’”^④这段引文显示出班昭注文体例为:先注字句、后疏通文意,末引证典籍。班昭《幽通赋注》“注释体例十分科学,内容亦详尽明晰,显然受到汉代经书注释的影响,但又无烦琐之弊,以明白晓畅为宗旨”^⑤,其优点极为鲜明。

班昭以外,汉代尚有延笃、胡广、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等人为赋作注,并依托《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解得以留存,而且“《史记》三家注,《汉书》萧该音义、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共征引东汉赋注584条”^⑥,足以说明东汉赋注的价值。另一方面,伴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的日益经典化,东汉赋注因之成为后世取法的典范。反观现存明代赋注如陈与郊《文选章句》,张凤翼《文选纂注》,闵齐华《文选瀹注》,大都是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所做的删减工作,并未有太多个人创见。即便陈氏《文选章句》有个人化改动,但也招致《四库全书总目》“点窜

① 踪凡、郭英德:《历代赋学文献的变迁、类型与研究》,《求索》2017年第3期。

②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第1页。

③④ [梁]萧统:《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9页,第269页。

⑤ 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济南:齐鲁书社,2021年,第127页。

⑥ 踪凡:《东汉赋注考》,《文学遗产》2015年第2期。

古人，增附己说，不出明人积习，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①的批评。总的来说，明人对《文选》的删注在价值上远不及李善旧注。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历代均诞生了大量的文献，然典范文献却变动不大，注疏之学亦如是。以经学为例，世有“礼是郑学”之说，郑玄的“三礼注”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人称道，唐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用郑玄注，清阮元样刻《十三经注疏》因仍不改，足见经典注疏的延续性与稳固性。赋注与之相类。明代学者虽有几部赋注作品，但主要是对唐宋辞赋作注，如南逢吉对宋王十朋《会稽三赋》所作之注，刘浴德对宋刘元宾《脉赋训解》所撰之注，谢昌为唐代卜应天《雪心赋》所做的注，而对汉魏六朝之赋未曾涉及，嗣后清代中晚期的赋注与之相类。这说明，元明以降的赋注家对汉唐注疏较为尊崇，其将东汉赋注、六朝赋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五臣注视为典范，前人旧疏既已上佳，后世自无续貂之意。

四、赋评勃兴

中国文学的评点之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易》之有系辞、说卦，《诗》之有《毛传》《郑笺》，乃至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视为其滥觞”。^②宋代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等散文评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评点文学的真正开端，元方回《瀛奎律髓》是标志性评点著作，终至明代迎来巅峰，诞生了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孙鑛、金圣叹等一众文学评点大家。孙琴安指出，明代中后期是评点之学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呈现出“评点队伍的空前壮大”“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的纷纷问世”“小说评点的空前崛起”^③四大特点。

与诗词、散文、小说评点的兴盛一道，明末清初的赋学评点亦迎来高峰。赋学评点主要集中于《文选》的评点。作为中国文学总集典范的《文选》在明末清初迎来评点热潮，赵俊玲强调：“明万历年间，这是《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文选》评点进入发展的高潮期；清中后叶，这是《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④明末清初的《文选》评点，共诞生了十二家《文选》评本。郭正域《选赋》，凌森美《选赋》，闵于忱《文选后集》，孙鑛《孙月峰先生评文选》，邹思明《文选尤》，钱陆灿《文选》评本，洪若皋《梁昭明文选越裁》，孙洙《山晓阁重订昭明文选》，俞场《昭明文选》评本，方廷珪《昭明文选集成》，何焯《文选》评本。辞赋评点与辞赋文本密不可分，既是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向导，其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文学价值。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水势云：“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湍弗湍汨，湍测泌，横流逆折，转腾激洌，澎湃沆漭，穹隆云挠，蜿漚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瀨，批壘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霑坠，湛湛隐隐，磅礴訇磕，潏潏淢淢，潏潏鼎沸，驰波跳沫，汨急漂疾，悠远长怀。寂寥无声，肆乎永归”。^⑤这段文字以联边字出之，典型反映出汉赋的“体物连类”特征，若无小学根基，极难成文。（孙本眉）云：“先波浥，次岩拥，次坻壑，又次波沫，挨序写来，然后归于无声，即盈科后进放海之意，而‘踰’、‘趋’、‘批’、‘冲’、‘临’、‘注’、‘驰’、‘跳’等字面下得特精峭，真是画水妙手，可味可玩。”^⑥（集成夹）云：“以上合写众水，物之奇怪变幻莫甚于水，故此段就八川分流，或从隘口上见，或从下瀨上见，字字各有意义，或就形取意，或就声取意，或亦字义取意，与枚乘‘广陵观涛’一段，可谓异曲同工，而鼻祖则

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734页。

②黄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评点（上）》，《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5期。

③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07-115页。

④赵俊玲：《文选汇评·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⑤[汉]司马迁撰：《史记》，第9册，第3017页。

⑥赵俊玲：《文选汇评》，第186页。

自《高唐》，后木玄虚、郭景纯《江赋》、《海赋》多脱胎于此。”^①明末清初赋评的勃兴是万历以降文学评点兴盛的赋学呈现，赋集所含评点对于揭橥汉赋的创作手法，赋体肌理，文章脉络均有重要意义。

首先，明末清初赋学评点丰富了中国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明末清初赋学处在古典赋学新旧转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赋学的文论概念，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理论形态。在传统的赋序、辞赋专论、赋尾评以外，又产生了辞赋评点这一新的理论形态。与其他赋评形态形成鲜明差异的是，辞赋评点具有小、快、灵的特征。评点的形式可以是眉批、题下批、旁批、尾评、圈点等多种形态，文字长短不拘，以抒发评点者的阅读感受为主。其与《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两都赋序》为代表的赋序、《文心雕龙·诠赋》《文赋》为代表的专论、《赋赋》为代表的论赋赋，以及清中后期以来诞生的赋话，一道构建起完整的中国赋学理论版图。

其次，明末清初的赋学评点以《文选》评点为中心，这固然与《文选》的典范性有关，也反映了元明以降对汉魏六朝古赋的推崇。清初之后，律赋勃兴。赋学评点的重心从《文选》所收古赋转向唐律赋以及清人所撰律赋。今存清人所编辞赋总集，大多对选录律赋加以评点。如清汤聘《律赋衡裁》便对所选 123 篇律赋加以圈点、旁批和尾评。评王棨《凉风至赋》云：“晚唐律赋较前人更为巧密，王辅文、黄文江，一时之瑜、亮也。文江戛戛独造，不肯一字犹人；辅文则锦心绣口，丰韵嫣然，更有渐进自然之妙。汤惠休云：‘颜光禄如镂金错采，谢康乐如初日芙蓉。’借以品藻二人，确不可易。”^②又评许敬宗《麦秋赋应诏》云：“初唐人俚语尚带沉郁古拙之气，高阳缪公独字字贴妥，恬雅近人，而心术之倾险如此，乃知千古小人，未有不能作软语者，词章固不足以定人品也。”^③清人律赋选集多有评点之文，以与注解相匹配，共同服务于阅读、仿拟、应试之用。从古赋评点到律赋评点既反映出赋学宗尚的转向，也凸显出明末清初赋学评点之于中国古典赋学的新变与发端意义。

当然，作为评点文学，注重抒发感兴，强调阅读引发的“神思”，固然是其优点。同时也应当看到，评点文学的通病在于“只注意一篇一章，一字一句，从而就忽视了对某一文学体裁或文学现象整体上的把握和观察，更缺少理论上的阐述，这就使评点文学这一批评形式缺少系统性、理论性和逻辑性”^④。明末清初的赋学评点，亦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张衡《西京赋》写楼台高奇一段，（集成夹）云：“此段写建章宫阙而及别风馆、神明台、井干楼之高，其通幅写高处，虽有三截，究只一意，不过取班作‘虹霓回带于棼楣’一句重重复衍，心思手足，俱被缚住，再是动弹不得，神气亦大减。故曰文字写貌则死，写神则活。于此求之，则手笔之高下，思力之巧拙，不难辨矣。”^⑤与《文心雕龙》等文论专书相比，确实存在体系性、系统性不足的弊端，与《文赋》《两都赋序》等专门性赋学论文比，又存在逻辑性、整体性不足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讲，赋学评点的直观性、直觉性值得推崇，但其体系性、逻辑性的不足之处已无需回护。然总体来看，明末清初赋学评点，是明清评点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明末清初赋学新变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特色文学批评的话语表征。

结语

赋学发展既有“名理相因，参古定法”的会通性，又有“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适变性。汉赋经典化是中国赋学史上一以贯之的主题，明末清初延续此前模拟、汇编、阐释汉赋的态势，实现“汉赋经典化”全方位建构。汉魏六朝时期确立的赋学批评话语，是中国赋学史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后世“照着讲”与“接着

① 赵俊玲：《文选汇评》，第 187 页。

②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第 614 页。

③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第 618 页。

④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的性质、范畴、形式及其他》，《学术月刊》2010 年第 2 期。

⑤ 赵俊玲：《文选汇评》，第 46 页。

讲”的话语资源。明末清初赋学批评缺乏原创性理论建树，未能脱出汉魏六朝确立的理论范畴。赋注的衰歇是学术大势转向的结果，明人致力于总集汇编、性理阐发、辞章评点，无形中忽略了赋注的雕琢。赋学评点的勃兴，拓宽了赋学建构的理论维度，丰富了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反映出明末清初赋论发展的新态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明末清初赋学的“通”体现为对既有赋学传统的延续，“变”则与特定时期的学术思潮息息相关。

A Research o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Fu General Transformation

NI Xiao-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Fu,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ere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ese classical Fu. “change” in “Tong” is the them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ng”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lassic situation of Han Fu and the elucid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The “change” is reflected in the decay of Fu annotations and the rise of Fu criticism. Han Fu is the beginning and climax of Chinese Fu studies. The compilation of Han Fu work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process of Han Fu classic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Fu stud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constitutes the main frame of Fu theor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decline of Fu not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s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cademic trend. The comments on *Wen Xuan*, which arose in Wanli,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of Fu discours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notes to comments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 studies.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Fu; gener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唐音]